

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两个美国人

□ 缪平均 刘文强 杨普秀

阳早和寒春是一对美国夫妇，他们从青年时代就来到中国，投身于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在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吃小米，住窑洞，饲养奶牛，转战陕北；在陕西西北部的三边，他们参加了创建新中国牧场的工作；在西安附近的草滩农场，他们同中国工人一道建设畜牧机械化；在首都北京，他们大力宣传延安精神，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40多年的光阴，数万里征程，这两位美国朋友在中国广阔的田野上留下了艰苦奋斗的足迹，播下了友谊的种子，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称颂，人们亲切而自豪地称他们是“咱们的美国老乡”。

“到中国去！”

阳早，原名欧文·恩格斯特，1918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家里很穷，父母亲带着10个子女过着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1938年，20岁的阳早以做临时工所挣的一点钱作学费，进入纽约州立大学学习农业。阳早常和同宿舍的朋友韩丁一起讨论人生和世界大事，探索改善社会处境的方法。正在这时，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记述红色中国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问世了。阳早和韩丁深深地被它吸引住了，他们激动地说：“人家不光讲革命道路，还真的发动群众，搞起了革命斗争，真了不起！”青年人目光，渐渐地集中在毛泽东头上戴的八角军帽的红星上面，心里燃烧起炽烈的希望之火。两个朋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一致决定：应该到世界的那一边看看，到中国去！

1945年上半年，韩丁来到中国。在重庆，他见到了正在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和韩丁亲切交谈，问他为什么到中国来，来中国之前是搞什么的，并一连串询问了许多关于农业的问题。回到美国后，韩丁激动地把他在中国的见闻告诉了阳早。阳早听后非常兴奋，立刻变卖了自己的奶牛、马匹和一些机械，准备前往中国。在朋友的帮助下，阳早参加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到中国的救济工作，身份是救济总署的奶牛专家。

阳早去中国的消息，传到了他的好友、韩丁的妹妹寒春那里。寒春原名琼·辛顿，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先在纽约州立大学学习3年，后又到著名的威斯康星大学专攻原子物理，参加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工作，是成绩优异、为数甚少的年轻女物理学家。寒春也很向往中国，积极赞助哥哥和阳早的行动，但她又舍不得离开她的加速器。阳早准备去中国了，寒春在华盛顿为阳早送行。两个憧憬着美好未来的青年，在华盛顿的秋风中暂时分开了。

1946年3月，阳早到了上海，在

联合国救济总署上海办事处工作，并设法同中国共产党驻上海办事处取得了联系。这位美国青年激动地向办事处负责人说明来意。办事处负责人对阳早的行动十分赞赏，周恩来副主席还在办事处接见了他们。经过周密安排，阳早宣布脱离联合国救济总署，从上海来到北平。

当时，以叶剑英为主要领导的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正同国民党谈判，他们热情地接待了阳早，准备护送他到解放区。有位工作人员问阳早：“你到了中国，又要去解放区，要不要起个中国名字？”“好啊！请你们帮个忙吧。”阳早十分高兴地答应了。大家想了又想，一位工作人员说：“上海《大公报》有个进步记者羊枣，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他是一个深受尊敬的革命者，你用他的名字，表示继续他的事业，行吗？”“太好了！”从此，他改名阳早，以表达同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信念。

在北平短住了一个时期之后，阳早坐上了飞往延安的飞机。

战火中的牛倌

1946年10月的一天，阳早乘飞机抵达延安。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来到了红星照耀的地方。几天之后，阳早来到延安杜甫川的光华农场。这个农场只有几十个人，几十亩地，还有几十头奶牛。他被分配到畜牧组干他的老本行，这位畜牧专家打心眼里喜欢这几十头荷兰良种奶牛，精心地饲养、照料它们。

正当阳早以喜悦的心情迎接他在延安的第一个春天的时候，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于1947年3月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猖狂进攻。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边区政府机关和各直属单位准备转移。

3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一辆吉普车把阳早接到了中央军委所在地王家坪，在一间普通的平房前停住了。阳早推门进屋，只见几个美国人坐在那里，有马海德、李敦白，还有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特朗。一会儿，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进来了，热情地同大家握手、问好。毛泽东操着湖南口音，微笑着问阳早：“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阳早回答说：“我原是纽约州的农民，现在在光华农场养奶牛。”这句话引起毛泽东的很大兴趣。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着阳早，兴奋地说：“农民，好啊，中国是农业大国，欢迎你来帮我们搞农业技术。”当时已是敌人正要进犯延安的紧急关头，但这些共产党领袖却镇定自若，谈笑风生。阳早感到他们身上蕴藏着一种不可战胜的勇气、信心和力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热情地邀请美国朋友一起吃晚饭，然后由周恩来向大家介绍国内形势，说明中央暂时撤离延安的部署、指导思想和革命前途，美国朋友听得个个心服

口服。

敌人逼近了延安城。光华农场接到上级命令：实行战略转移，向延安城北撤退。阳早和同志们赶着那几十头荷兰奶牛，开始转战陕北。行军中紧张的一天来临了：敌人误以为这支农场队伍是解放军主力，便紧紧追赶。阳早他们使劲地轰赶着那些步履蹒跚的奶牛，艰难地行进着。傍晚时分，一条河流挡住去路。河并不很宽，但水流湍急，有的地方还打着漩涡，河面不时漂过几片薄冰。河面上一架由木头搭起的简易小桥，被水冲得摇摇晃晃。人可以相互搀扶着从桥上走到对岸，可那几十头奶牛怎么办呢？

紧急关头，阳早决定自己和牛一起游过河去。他告诉大家：“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丢掉这些奶牛，它们为中央首长和边区的孩子们提供过牛奶，今后还要靠它们发展大牧场呢！”说着，他把牛一头头赶下水去，自己也“扑通”一声跳进冰冷的河水里，保护牛群前进。当阳早赶着牛游到对岸时，他的身体已经冻僵了。历时一年的转战结束后，领导和同志们对阳早的工作作了高度评价。他的鉴定上这样写道：“对革命胜利有信心，1947年战争中表现坚定。”

圣地花烛

在华盛顿送别阳早之后，寒春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原子弹爆炸时的火光，妇女儿童惨死前的呼叫，美国军方对科学研究的干涉，使这位年轻的核物理学家多年来走纯粹科学道路的幻想破灭了。正在这时，她接到阳早自中国解放区发来的长信。信中対延安生活的描写，又使寒春看到希望。她拿定主意：到中国去，和阳早一起共同战斗！1948年初，寒春远渡太平洋来到中国。

1949年2月，寒春搭乘解放军的军用卡车来到延安。当时，阳早正在陕北瓦窑堡农具厂工作，闻讯后立即赶回延安同寒春见面。4月，这两位来自太平洋彼岸的青年在革命圣地延安结婚了。婚礼是在边区政府礼堂举行的。中国同志像过节一样筹办阳早、寒春的婚事，按照陕北风俗，青少年们点燃了噼噼啪啪的鞭炮，乐队吹喇叭敲锣鼓。为了使婚礼具有美国特点，大家还举行了简单的舞会。新房是边区政府接待组的客房，里面摆满了同志们赠送的礼品、喜幛、对联，不少同志还赋诗作画祝贺新禧。最醒目的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赠送的“爱情与真理的结合”的喜幛和一副写着“万里良缘，圣地花烛”的喜联。

陕北的生活是艰苦的，而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却觉得苦中有甜、苦中有乐。一次，阳早过生日，按照美国的风俗要做个大蛋糕，插上蜡烛，以示祝贺。可陕北当时哪有蛋糕呢？聪

明的寒春还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傍晚时分，她拉着阳早的手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要对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祝你在陕北度过这难忘的日子。”说完，她转身捧出一样东西，那是一个用黄泥土捏成的大号双层蛋糕，上面刻了很多很细的花纹，乍看起来还和真的一样呢！没有蜡烛，就在蛋糕上插了一根根小木棍。阳早高兴极了，双手捧起那个蛋糕，上下左右看个没够。这在陕北高原用泥蛋糕过的生日，永远印在阳早、寒春的记忆里。因为它代表着纯真的爱情，代表着他们同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创造崭新生活的崇高理想。

“要用延安精神搞四化”

1949年8月，阳早、寒春和战友们向更偏僻、更艰苦的陕北定边县进发了。那里紧靠内蒙古，有着广阔的草原。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的指示，要在那里建设一个三边牧场，场部设在定边县的城川镇。阳早、寒春和同志们一起努力地工作着，他们尊重牧民的风俗习惯，学习他们的语言，不要任何报酬地为他们提供种畜，利用科学知识为牧畜防病治病。牧场的规模一天天发展起来了，阳早、寒春和牧场工作人员成为牧民最可信赖的朋友。

在三边牧场工作了两年之后，阳早、寒春被调到西安，先在西安奶场工作。1955年，他们来到西安城北20公里渭河之滨的草滩农场，和那里的工人、农民一起度过了10个春秋。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为农场设计建成了我国当时最先进的奶牛场自动化挤奶管道专用线，为我国奶牛场机械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6年4月，阳早、寒春被调到北京，阳早进了电影局，寒春在对外文委工作。

1973年3月8日，阳早、寒春出席了人民大会堂“三八”茶话会，周恩来总理同他们热情握手、亲切交谈，告诉他们：毛主席早就主张世界革命不分种族，中国人和外国人应该一样，主席很关心外国朋友。周恩来还说：“你们、我们都在经受考验，我们一块干革命。”这些充满真挚感情的话语，使阳早、寒春兴奋不已。

后来，阳早、寒春再次请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经黄华安排，他们又回到农村，来到北京郊区的红星公社，在牛场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市畜牧机械化顾问、农机部顾问、畜禽机械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40多年过去了，阳早、寒春从未忘记在陕北战斗的岁月，他们经常向人们宣传延安精神，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诚恳地告诉周围的人们：“必须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要用延安精神建设四个现代化。”

（摘自2017年第12期《档案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为周恩来开车的司机叫钟步云。1955年周恩来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钟步云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印尼途中，因遭到国民党特务暗算，飞机被定时炸弹炸毁于沙捞越附近海域，钟步云师傅不幸遇难。

钟师傅的继任司机叫杨金铭，比周恩来小24岁。

杨师傅不仅驾驶技术好，后来还兼任西花厅党支部副书记。由于他工作特别细致，还承担周恩来、邓颖超的日常家务理财工作。即周、邓两人每月工资都由杨师傅去领。平常使用时，或者由杨师傅用，别人证明；或者别人从杨师傅那里领钱，用过后再向他交账。因此，杨金铭至今还保存着周恩来的家用记账本，记录着周恩来的那一笔笔家常日用，也记录着开国总理的廉正之风。

据杨金铭女儿杨毓华介绍，她爸爸管总理家的账时，五分钱大葱、一毛四分钱盐等等都记得清清楚楚，谁买的，谁收的，谁证明的都写得明明白白。

有一次，杨师傅等人在向周总理报账时（周恩来平常不过问自己的家庭账目），周总理突然浓眉紧锁地问：“这次盐怎么多花了一分钱？”开始大家以为杨师傅记得那么详细、清楚，况且仅仅还是一分钱，谁也没有在意。但是周总理没有放过，仍要再查看一下收据。杨师傅赶紧再细查一遍，结果发现盐确实贵了一分钱。周恩来马上让秘书打电话，向北京市有关部门询问盐为什么涨价。后来查明是因为预防脖子病，在食用盐里加碘而导致涨价。

问清情况后，周恩来这才放下心来，并严肃认真地说：“我不

武殿生：保护群众 忠魂永铸

□ 王 松

武殿生，1953年11月8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海伦县（今海伦市），197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7年退役后成为黑龙江省伊春市公安局伊春分局旭日派出所民警。1980年8月13日，抓捕犯罪嫌疑人时，武殿生被对方扔出的手榴弹击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7岁。

在担任户籍警两年多的时间里，武殿生破案10起，亲手抓获犯罪嫌疑人和违法人员35人。他还先后帮教12名青少年改掉恶习。

工作上，武殿生公私分明。一次，有个熟识的干部求他与户政部门通融通融，为其一个亲戚办理农转非户口，并送来了猪肉等礼物。武殿生拒绝了他，退回了礼品，还向他耐心地解释户籍政策，并教育他要按政策办事。

1980年8月11日晚，一临时

周恩来的『记账本』

□ 秦九凤

是在乎一分钱的开支。而是因为盐价关系到全国亿万人民的生活，是不能随便涨价的。”直到这时，老杨师傅才意识到，周总理要他报账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考虑他自己的收支，而是借听账来了解市场和社会，以便指导和决策国家经济，周总理是在时时事事考虑着国家、人民的利益。

（摘自2001年第5期《党史天地》，原标题为《一位汽车司机眼中的周恩来总理》）



我父亲管开智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工作在毛主席、朱总司令身边。在父亲可以查阅的档案里，一页纸上有寥寥几行字：1921年3月出生於四川营山，1933年参加儿童团，1937年冬到延安中央警卫营任警卫战士，1940年初担任朱德总司令贴身警卫，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朱德总司令的安排，离开中南海，南下西南参加地方建党建政和征粮剿匪工作。

“绝对忠诚，绝对保密，绝对安全”，既是父亲战火青春的写照，也是他军旅生涯中不变的信念。

记得一个晚上，我从军校毕业休假回到家，父亲叫我到书房，威严的目光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转身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黑色文件包。

我心中陡地一颤，这个文件包我早年见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个“非常年代”里，一个雨夜，开门声与脚步声让我下意识抬头望向客厅，我看见父亲将这个黑色文件包裹在川西坝子老乡常用的棕麻雨布里，悄声对一个农民模样的青年人嘱咐着什么。青年人点了点头，走出家门，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倾盆大雨之中。

这时，父亲轻轻地打开暗锁，从黑色文件包中取出一个在中南海工作时的笔记本。翻开页面，两个遒劲的大字映入眼帘：前进。我的眼睛亮了。

父辈的荣光

□ 管 严

父亲说：“这是我在中南海工作时，毛主席对我的鼓励。朱老总看见后，连说主席题得好啊！前进，既是你要前进，也是全党、全国人民要前进！朱老总也挥笔给我题词：努力工作。”

讲起这段难忘的往事，父亲十分激动，像是在深情回忆，又像在娓娓诉说。

1937年冬天，父亲被组织安排在中央警卫营工作。一天，他奉命骑马去执行任务，转过一个河湾，突然看见朱总司令和其他领导同志迎面走来，父亲立即收住缰绳。可奔跑的马儿借着惯性冲到了总司令身边，父亲赶忙举手敬礼。总司令停止了交谈，笑容满面地看着他，右手伸向眉间，正正规规地还了一个军礼。总司令给父亲这个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还礼，让他激动得热血沸腾……

不久，组织选派父亲到总司令身

边担任警卫员。父亲知道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但心中很是忐忑不安，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这项重要工作。报到时，见父亲有点紧张，总司令便放下手中的文件，和他拉开了家常。总司令一脸慈祥，问他家在哪里，多大年纪，参军几年了。父亲见总司令不但没有一点架子，还十分和蔼可亲，心情也随之放松了。总司令认真听着，不时地点点头，还鼓励他：“你年纪还不小，在这里除了工作外还要多学文化，学一点革命理论。”

谈到担负的警卫工作时，总司令严肃认真地说：“你是组织上派到我这里来工作的，我们是同志关系，都是为党工作，只是分工不同罢了。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安全的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是无法补偿的！”

“绝对忠诚，绝对保密，绝对安全！”父亲心里一热，鼓起勇气答道。

总司令赞同地说了一声：“好！”这句发自内心、脱口而出的话，便成了父亲多年来担任总司令警卫工作始终遵循和追求的目标。

这天夜里，父亲和我彻夜长谈，回忆了很多战争年代的往事。他给我讲了在延安窑洞里第一次见到总司令补衣裳的情景。闪烁的油灯下，总司令盘腿坐在炕头，一边缝补衣裤、鞋袜，一边拉家常说：“老百姓说得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干革命，更要提倡艰苦奋斗。”总司令有的衣服补丁摞补丁，甚至到了没法穿针引线的程度，他都舍不得换新的。连铺在炕头的一床草垫子缝了个大洞，总司令也要补好后继续使用。

父亲还讲了总司令一次发脾气的故事。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总司令的工作非常繁忙，时常通宵达旦，有时还要带着大家上山挖野菜。司务

长见总司令那样辛劳，生活又很清苦，便买了点好菜，准备给首长改善一下生活。

总司令知道了，很生气，当即批评司务长：“人的嘴都是一样的嘛，为什么我要搞特殊呢？！”

当时父亲也壮着胆子提意见：“总司令，您年纪大了，肩上担子重，责任大，您不能不关心自己的身体呀！”

总司令见大家一脸认真，笑着说：“吃苦耐劳是革命者的本色嘛，我也是普通一兵哟！”

总司令关心自己少，却时时刻刻记着官兵的生活。那阵子，各抗日根据地物资供应陷入空前困境，为打好南泥湾垦荒战役，年近六旬的总司令也经常抽空下地干活。他和年轻人一样，带着干粮和水上山砍荆棘、除杂草，选地、翻地。劳动累了，总司令还带头喊号子，为大家鼓励。

那天晚上是我长大以来，父亲第一次给我讲述这段光荣的历史。我知道，因为我已穿上了军装，从此，父亲不止把我看作是孩子，更是看作一名军人，他要让我懂得这段历史，接过这份责任。父亲讲得十分动情，我听得热血沸腾。

“永远不要忘记，在军人的心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生命高于一切。”多少年过去了，父亲的话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坚定的信念。

大江流日月，岁月代古今。在新的历史机遇期、新的发展起点上，每每回忆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伟人风范，我都心潮澎湃、激情满怀。“前进”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繁荣昌盛，“努力工作”才能无愧人民的期待、历史的选择，“绝对忠诚，绝对保密，绝对安全”是父亲对我的叮嘱，激励着我在改革强军征程中不忘初心，奋勇前进。

（摘自2017年第6期《新湘评论》）

